

京华四事存真

主编 苏天钧



北京市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研究所
史志·地理·名胜·古迹丛书



京 华 旧 事 存 真

(二)

主 编 苏天钧

北 京 古 籍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206号

京 华 旧 事 存 真

(二)

主 编 苏 天 钧

*

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北京新丰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9.125印张 240000字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7-5300-0074-8/K·35

定价: 5.60元

目 录

燕君“禅让”辨·····	王彩梅 (1)
“蓟城”前史初探·····	李江浙 (17)
北京古代城址变迁·····	于德源 (40)
有关北京长城的几个问题及对万里长城的认识与 评价·····	王 玲 (53)
北京市地名通名的特点和类型·····	尹钧科、 <u>张祖兰</u> (71)
北京城史杂考·····	于德源 (79)
建立个人主题文献库《中国史学方法》讲稿之 一·····	钟少华 (90)
北京防洪系统工程的形成——永定河堤防考·····	贾振文 (112)
浅说北京的音乐文化·····	劳允兴 (131)
清前期北京社会结构简论·····	吴建雍 (146)
国民革命军占领京津与北洋政权的覆灭·····	习五一 (160)
北京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	赵庚奇 (173)
近代北京知识分子的觉醒与外来文化的选择·····	魏开肇 (203)
中国奴隶社会起源考·····	李江浙 (221)
北京地区辽代砖室墓形制研究·····	苏天钧 (241)
李卓吾居京史事考·····	李宝臣 (265)
话须真诚方传远 语必关风始动人 ——口述史学方法漫谈·····	钟少华 (275)
第二辑 封面图片说明为：万历帝翼善冠（定陵博物馆珍藏）	

燕君“禅让”辨

王彩梅

公元前四世纪，地处今北京地区的燕国，发生了震惊战国七雄的“燕王哙让子之”事件。这是燕国史上的大事，它不仅仅酿成了燕国的内乱，而且还招致了其他国家乘机出兵干涉，从而引起了一场内外矛盾纵横交错的战争，几乎导致了燕国的灭亡，后世史家对此也有各种不同的评论。然而这次事件的性质是什么？它的历史真象究竟如何？这在燕国历史上还是一个至今尚未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古今评论

公元前316年^①，燕国国君燕王哙，将自己的君位“禅让”给相国子之，并且还将三百石以上官吏的印玺收回交给子之，听从他重新任命。于是，“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于子之”^②。经过这次“禅让”后，燕王哙把燕国大权已全部交给了子之。

对于这个事件究竟应该怎样看，自古至今一直就存在着各种评论。战国及汉代的学者们有不少人在著作中提到这次事件，他们的意见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从总结统治经验的角度出发，所提意见也是各种各样，其中有的认为燕国的禅让所以遭到失败，是由于这个事件出现于当时是不合时宜的，例如：

《庄子·秋水篇》云：

昔者尧舜让而帝，之哙让而绝，汤武争而王，白公争而灭，由此观之，争让之礼，尧桀之行，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

《淮南子·人间训》曰：

夫徐偃王为义而灭，燕子哙行仁而亡，哀公为儒而削，

代君为墨而残。死、亡、削、残暴乱之所致也，而四君独以仁、义、儒、墨而亡者，遭时之务异也。

也有的认为，燕国发生的事件是由于燕王哙好让，图虚名，未实行法治的结果，《盐铁论·诏圣篇》曾有以下一段分析：

故法令可仰而不可窺，可临而不可入……鲁好礼而有季孟之难，燕哙好让而有子之之乱。礼让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明君据法，故能长制群下而久守其国也。

《潜夫论·实贡篇》也说：“燕哙利虚誉，故让子之。”对此事评论最多的是《韩非子》一书。在这部书中，有不少篇章从各方面对燕王哙让位给子之的事件进行了评论，其中论点之一，是认为燕王哙用人不明。例如，在《说疑》篇中说，燕国“地方数千里，持戟数千万”，而燕王哙最后却落得“身死国亡，夺于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不明乎所以用臣也。”这里所说的“不明乎用臣”，就是指的对子之的任用是不适当的。

1977年在河北省平山县发掘了战国中山王墓，出土了很多重要的古代文物。中山国是燕国的近邻，燕国发生的“燕王哙让子之”事件，中山国的统治集团不仅耳闻目睹，并且最后还参加了侵燕的战争，在出土的“中山王罍壶”中有长篇铭文，其中有一段记录了中山国统治者对燕国发生的燕王哙禅让事件的看法：

郾（燕）君子匱（哙），不驩（辨）大义，不置（忌）者（诸）侯，而臣宗易立（位），以內疆（绝）邵公之業（业），乏其先王之祭祀……则崗（上）逆于天，下不忍（顺）于人施（也），寡（寡）人非之。

从这段铭文中可以知道，中山国王对燕国发生的禅让事件是不满意的，而且还坚决反对，主要指责其“臣宗易位”，这是大逆不道的，所以明确表示“寡人非之”。

古代人对这个事件发表看法的当然还有很多，这里只是选录了一部分。现代学者们对此事也有各种各样的评论，郭沫若对这一事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燕王哙能够将国君的位置禅让给臣下，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在《奴隶制时代》一文

中有一段专门的论述，现摘录如下：

唐虞禅让是原始公社制残留下来的史影，被春秋末年以后的儒家和其他的学派所理想化了，作为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而企图去追踪，这种理想化的动机是出于改革当时社会的要求的，我们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应该认为是当时的一种进步的倾向。燕王哙就是在这种倾向的影响之下而闹着禅让的实践的。作为一国的国王，能把自己的位子心甘情愿的让给臣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燕王哙办到了，足见他不同寻常^③。

杨宽教授对禅让事件的性质也是肯定的，对子之的评价也比较高，他在《战国史》一书中说：

公元前316年（燕王哙五年），燕王哙把君位让给了相国子之。子之为相国时，办事果断，善于监督考核臣属，得到燕王哙的赏识和重用……燕王哙和子之想要通过禅让的办法来确立地主政权和进行封建的政治改革。

他还说：“〔燕王哙禅让〕为后来燕昭王奋发图强，进行封建的政治改革扫清了道路”^④。

金景芳在他所著《中国奴隶社会史》一书中也认为：“燕王哙让国一事，也应列入战国时期变法范畴之内”^⑤。

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史》编写组所编的《北京史》一书认为，燕国这次禅让事件是“一部分奴隶主，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所进行的政治改革”^⑥。

侯仁之、金涛所著的《北京史话》一书认为：“燕王哙把君位让给相国子之”，这是“以图振兴燕国”^⑦。

以上各家，有的认为这是“变法”，有的认为是“图治求强”，有的认为是封建地主阶级为“确立地主政权和进行封建的政治改革”，有的认为这是奴隶主阶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而进行的“改革”。尽管如此，但有一个基本观点是共同的，各家都认为这次禅让事件的性质是“进步”的，是一次改革，应该给予肯定。可以说，这个基本观点在当前学术界得到了相当多数人的

支持，在社会上具有较大影响，现在看来，这个看法还值得商榷。但是有一点要明确下来，对这次“禅让”事件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这首先需要辨明“禅让”事件的历史真象，在这基础上才能作出适当的分析和论断。

二、史实辨析

在燕王哙禅让事件中，有很多历史事实需要进一步分辨清楚，但其中最根本的还是这次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其性质。

关于禅让发生的原因，最流行的看法就是所谓“仿效尧舜说”，其基本内容是认为燕王哙所以把国君的位置禅让给于之，就是因为燕王哙想仿效尧舜禅让的故事，因而便身体力行，将君位让给于之。这个说法虽然流行很广，但今天看来，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史实上进行考察，此说都很难成立。

真正的禅让，也就是说一个国君在没有任何外界压力的条件下，不是被迫的而是自觉自愿地将国君的位置禅让给比自己能力强的人，让他当国君，自己则心甘情愿地作他的臣下，或者去当平民百姓，接受其统治。似这种出于真心的、纯粹的禅让，就中国历史而言，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道理很简单，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肯于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翻开历史来看，在中国历史上，自从夏代进入阶级社会后，历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直到明清为止，在位的国王、皇帝很多，虽经过多次更替，但还没有发现一位确实是真心实意的、肯于把自己的君位禅让给其他人的国王和皇帝。

不仅阶级社会如此，就是处于刚进入阶级社会前夕的尧舜禹之间的禅让，也未必似后世儒家所美化的那个样子。其真实情况如何，现在看来也是值得研究的。早在三十年代，“古史辨”学派就提出了这个问题，顾颉刚写了一篇《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③，认为尧舜禅让的故事是战国时的墨家学派伪造的。这个说法虽然不一定确实，但他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尧舜禅让的故事未必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

当然，联系我们现在所要探讨的问题来讲，关键之处还不在于历史上是否确实存在着尧舜禅让这件事，而是燕王哙是否真正为了要仿效尧舜而将君位禅让给子之的。

考察这个问题，需要从审定资料开始，这是解决问题的依据。应该明确的是：燕王哙已经将君位禅让给了相国子之，这已是既成事实，无庸再议，现在需要探讨的问题是：在燕国历史上为什么会出现这次禅让，其真实情况又是什么？

在现存资料中，比较详细地记载这方面具体情况的史籍是《战国策》、《韩非子》、《史记》等书，就时间先后来讲，《战国策》、《韩非子》的时代较早，《史记》的时代稍晚；就其内容来看，以《韩非子》的记载比较详细。为了便于分析问题，现将《韩非子》中的有关记载摘录如下：

《韩非子·外储说右》：

子之相燕，贵而主断。苏代为齐使燕，王问之曰：“齐王亦何如主也？”对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对曰：“昔桓公之霸也，内事属鲍叔，外事属管仲，桓公被发而御妇人，日游于市。今齐王不信其大臣。”于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闻之，使人遗苏代金百镒，而听其所使之。

一曰。苏代为秦使燕，见无益子之，则必不得事而还，贡赐又不出，于是见燕王乃誉齐王。燕王曰：“齐王何若是之贤也！则将必王乎？”苏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爱不均。”燕王曰：“其亡何也？”曰：“昔者齐桓公爱管仲，置以为仲父，内事理焉，外事断焉，举国而归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诸侯。今齐任所爱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知闻也。”于是明日张朝而听子之。

潘寿谓燕王曰：“王不如以国让子之。人所以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许由必不受也，则是尧有让许由之名而实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国让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则是王有让子之之名而与尧同行也。”于是，燕王因举国而属

之，子之大重……。

一曰。燕王欲传国于子之也，问之潘寿，对曰：“禹爱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故传天下于益，而势重尽在启也。已而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尧、舜明矣。今王欲传之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传之，而实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玺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遂重。

《战国策》中的记载，与此基本相同，只是在少数文字和个别段落上有些区别，其内容是一致的，而且在现存史籍中又未发现对此事件有相反的记载。《史记·燕世家》中关于此事的记载，又是抄自《战国策》的，依照这种情况来看，《战国策》与《韩非子》二书所记内容，应是比较可靠的，这可能就是战国时期社会上比较流行的说法。

仔细阅读上述记载，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所谓仿效尧舜的方式进行“禅让”，这并不是燕王哙在没有外力干涉之下，自己主动提出来的意见，而是他人在劝说燕王哙让位时而提出的借口，燕王哙只是“接受”，或者说是“按照”这个意见办的。至于燕王哙为什么要按照这个意见办，这还是一个需要研究探讨的问题。

目前，存在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就是对“禅让”方案提出的具体过程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因而在有些著作中，似乎燕王哙理所当然地是自觉自愿地实行“禅让”。有了这个认识以后，一系列看法就随之派生出来了。有的说燕王哙“禅让”的原因是“爱才”，即爱子之之才；有的说是为了“求治图强”；有的说是为了向古代圣贤学习，仿效尧舜的禅让；甚至有的就直截了当地说燕王哙就是“好让”，言下之意，似乎他有点禅让之癖。凡此种说法，实际上都没有什么可靠的根据，都属于判断性的意见。这些判断的立足点，也都是建立在燕王哙是自觉自愿地实行禅让的基础之上的。

另一个问题，就是燕王哙禅让的性质问题。这个问题，长期

以来也未得其解。郭沫若的分析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化时，曾将燕王哙让子之事件与秦国的商鞅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并列，提出：“燕王哙和子之闹禅让（公元前316）一事，在今天看来，是应该用另眼看待的”。他分析战同时期各国变法的性质时说，在战国七雄中齐、韩、赵、魏四国是“采取了革命手段”进行变革；而“楚、秦、燕是采取了由上而下的改革”^①。这就明确地把燕王哙禅让事件的性质定为“自上而下的改革”了。这个说法对学术界的影响较大。此后，又出现了一些相近的说法，如：“缓和阶级矛盾”说，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改革”说等等，也陆续提出来。现在看来，这些论断都还值得重新考虑。

探讨这个问题的关键，主要是需要弄清楚禅让的方案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什么人提出的、其目的是什么？

从上述《战国策》、《韩非子》所记载的内容中可以看出，这个方案是那些向燕王哙进行劝说的人提出的，其中有苏代、潘寿，是否还有其他人，今天已不清楚了。据《史记》中的记载还有鹿毛寿，《史记索隐》认为鹿毛寿即潘寿。燕王哙是在他们的劝说下接受了这个方案的。然而，他们提出这个方案的目的是什么？有何背景？现在，想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从根本上来讲就必须由追查子之的情况入手。

子之其人，在燕国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他担任燕王哙之相，身居高位，总揽全国政事，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还要进一步谋取国君的位置。在现有史籍中有不少处提到了子之，其中对子之的评论都是很不好的。如《韩非子·亡徵篇》云：

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爱信之而弗能废者，可亡也。”

陈奇猷集释案云：“谓主又信爱其相而弗能废弃之也，如燕哙之信爱子之是也”。

子之的权势很大，燕王又无力量将他废弃，在韩非看来，这就是亡国的象征。正如陈奇猷在注释中所述：“子之相燕，操生杀之柄，民信畏之……是以曰，民信其相乃亡国之徵”。这是把子之说成是奸佞之臣，其性质相当于《荀子·臣道篇》中所

说的“态臣”。荀子在这篇文章中说：“人臣之论……故用圣臣者王，用功臣者强，用篡臣者危，用态臣者亡。态臣用，则必死，篡臣用，则必危……。”此处之“态臣”，杨倞注：“佞媚之臣。”

《韩非子·说疑篇》还把子之与齐之田恒、宋子罕、鲁季孙意如等并列，云：

若夫齐田恒、宋子罕、鲁季孙意如、晋侨如、卫子南、郑太宰欣、楚白公、周单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为其臣也，皆朋党比周以事其君，隐正道而行私曲，上逼君，下乱治，援外以挠内，亲下以谋上，不难为也。如此臣者，唯圣王智能能禁之，若夫昏乱之君，能见之乎？

这里说子之是个不走正路（“隐正道而行私曲”）、“朋党比周”、好干犯上的作乱者。

子之还善于耍弄手腕，《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门者何白马也？”左右皆言不见，有一人走追之，报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诚信不。

在这里，子之虚构了一个“白马”的故事，以此来考察左右对自己是否忠诚，据此可以看出，子之是一个善于耍弄权术的人。

子之不仅善于耍弄权术，而且还是一个觊觎国君位置的、并抱有篡夺之心的人。为了这个目的，子之竭力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即前引《说疑》篇所引的“朋党比周”、“上逼君、下乱治”、“亲下以谋上”等等。此外，《韩非子·外储说右》在记述子之如何依仗权势培植私人势力的情况时还说：

夫人主之所以镜照者，诸侯之士徒也，今诸侯之士徒皆私门之党也。人主之所以自浅谄者^②，岩穴之士徒也，今岩穴之士徒皆私门之舍人也。是何也？夺觝之资在子之也。

子之所以大力培植私人亲信、拉拢党羽，其目的就是为了夺取君权。前面提到的向燕王哙进行劝说的苏代、鹿毛寿等人，就是起了为子之实现这个目的而做说客的作用。

鹿毛寿（或潘寿）的情况如何？现在还不太清楚，《韩非子·外储说右》只说：“潘寿，闾者^①。燕使人聘之。”可见，他是个“隐者”，大约年龄也不会太小，很可能是受了子之拉拢或者根本就是属于子之党羽一类的人物。因而《韩非子·外储说右》中在叙述他初见燕王哙时说：“潘寿见燕王曰：‘臣恐子之如益也。’”他一见燕王就开宗明义地说明，他所担心的就是子之的权力不巩固，因而劝燕王哙不仅单纯地将君位禅让给子之，还要让子之能培植个人的势力。在他的劝说下，燕王哙“收玺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于是“子之遂重。”潘寿的立场是很明确的。

有关苏代的情况史籍中稍有些记载，他向燕王哙劝说的目的，就是为子之取得君位。苏代与子之关系密切，在《战国策·燕策一》中有以下记载：

燕相子之与苏代婚，而欲得燕权，乃使苏代持质子于齐，齐使代报燕^②。

按照这里所记的情况看，苏代与子之不仅是姻亲关系，而且还有紧密的政治联系。苏代能够到齐国去，就是子之在其中起了作用。苏代到齐国后，又作为齐的使臣到燕国来，于是发生了劝说燕王哙的事件。

苏代为什么要积极地向燕王哙进行劝说呢？在《韩非子·外储说右》中有以下记载：

苏代为秦（齐）使燕^③，见无益子之则必不得事而还，贡赐又不出^④，於是见燕王乃誉齐王。

从以上记载中可看出，苏代与子之在政治上是互相利用的。子之在燕国掌权，他想使苏代以外交人员的身份劝说燕王哙让位，而苏代到燕国来从事外交活动，如无益于子之，则他的外交任务完不成，也得不到赏赐。在这种情况下，两者为了各自的利益结合起来了。苏代的劝说活动很成功，对燕王哙发生了作用，子之对此也很满意。《战国策·燕策一》中说：“〔苏代劝说燕王哙重用子之以后〕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遗苏代百金，听其所使。”

此事在《韩非子》与《史记》中均有记载，《韩非子·外储说右》中所记如下：

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闻之，使人遗苏代金百镒，而听其所使之。

两者所记基本相同，说明此事在战国时期，它的流传范围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到汉代，司马迁又根据《战国策》的记载，将它写进了《史记》，所以《史记》中关于此事的记载与《战国策》是相同的。

子之赠送给苏代“百金”，这就是赠送给苏代劝说燕王哙活动的报酬，两人的勾结，在这里已表示得很清楚了。

由此可见，燕国禅让事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当时向燕王哙进行劝说的人，也是有其政治背景的，这个事件的幕后指挥者，就是子之。

子之为什么能够使自己受“禅”成功呢？主要是由子他培植了个人势力，掌握了燕国很大的权力。在《韩非子》一书中，有很多处论述燕国禅让事件的教训，例如在《爱臣篇》中，就有以下一段明确的记载：

昔者纣之亡、周之卑，皆从诸侯之博大也；晋之分也、齐之夺也，皆以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皆以类也^⑤。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从此术也。

这里把燕王哙“禅让”的事件，完全看作是一场向国君篡夺政权的事件，并提出了一个篡夺君权的规律性表现，那就是臣下的势力太大，即“诸侯之博大”、“群臣之太富”等，子之也正是由于掌握了过大的势力，才敢在背后指挥这场“禅让”事件。

“禅让”二字，只不过是个体好听名称，其本质就是篡权。苏代、鹿毛寿等人向燕王哙提出让燕王哙学习尧舜、将君位禅让给子之的建议，实际上就是明目张胆地向燕王哙索要政权的方案。任何一个国君，一旦处于这种局面下，都会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也都会明白这样做的结果意味着什么。燕王哙不是白痴，他也不会不明白这件事的利害关系，然而他又为什么接受了鹿毛

寿等人提出来的“禅让”方案呢？这没有其他解释，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已经培植起来的子之的政治势力的压力下，而被迫接受了这个方案。

燕王哙的禅让，并不是仅仅将君位禅让给子之就算完结了，他必须还要把三百石以上官吏的印玺收回，交给子之，由他重新任命。这是为什么？其问题也很明显，燕国的原任官吏，都是长期在燕王哙手下任职的，现在君权已经“禅让”给子之了，子之不愿继续任用原有官吏，而要重新任用一批顺从自己、忠心为自己服务的大小官吏，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就从这一点也可看出，燕王哙的禅让，并不是“让贤”。子之也并不“贤”，这种重新任命官吏的办法，完全是为了组织自己的私人势力，以便于独自专权，这中间哪里还有一点爱国爱民的气味！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战国时期，在燕国发生的这次“禅让”事件，其性质完全是在统治阶级内部暴发的一场争权夺势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子之经过长期准备，在政治力量对比中占据优势，因而取得胜利，政权到手，“禅让”完成，子之的政治目的也就达到了。

三、“禅让”对燕国的影响

燕国的“禅让”不是改革，两者性质不同，社会效果也完全相反。改革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战国时期各国普遍进行的变法和改革，也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如：齐威王的改革，使齐国“大治”，“於是齐最强于诸侯”^⑥；楚国吴起变法后，“诸侯患楚之强”^⑦；商鞅变法后，“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⑧；韩申不害执政后，“国治兵强，无侵韩者”^⑨。可见，大凡改革者，都对国家的富强起了重要作用，其社会效果都比较好。而燕国的“禅让”则截然不同，它的结果不仅没能使燕国富强，反而引起了燕国的内乱。《战国策·齐策二》说：“子哙与子之国，百姓不戴，诸侯弗与”。可见，这次禅让无论在国内、国外

都得不到拥护者，反对最激烈的还是在国内。

自从子之篡夺燕国政权后，引起国内不满，公子平联合将军市被起兵反抗子之，因而引起了燕国的内战，使燕国遭到严重的损失。关于这次战争的具体情况，在《战国策》和《史记》中均有记载，《史记·燕世家》云：

三年^②，国大乱^③，百姓恫恐。将军市被与太子平谋，将攻子之。诸将谓齐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齐王因令人谓燕太子平曰：“寡人闻太子之义，将废私而立公，饰君臣之义，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为先后。虽然，则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党聚众，将军市被围公宫，攻子之，不克。将军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将军市被死，以徇。因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众人恫恐，百姓离志。孟轲谓齐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燕君哙死，齐大胜。燕子之亡。

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这场战争十分激烈，“构难数月，死者数万”，损伤是很惨重的。齐国也想趁燕国内乱的时机占领燕国，因而也插手了这次战争，在这次战争中，燕王哙与子之皆死。

关于齐国插手这次战争之事，与孟子也有牵连，因此在《孟子》一书中对此也有一段记载，可作为对《史记》、《战国策》内容的补充。《孟子·梁惠王下》记载，当燕国内乱时，齐宣王问孟子是否可以伐燕，孟子作了比较系统的回答，其中有以下一段话：“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是说，齐伐燕，燕人反而欢迎齐军。此事在《史记》和《战国策》中写得比较具体，《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齐伐燕时，燕国的“士卒不战，城门不闭”。敌军打来，不但不抵抗，反而大开城门，这说明燕国人民对统治者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已经达到了极点。因此齐军能很顺利地占领燕国。

1977年在河北省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中山王𡈼壶及中山王𡈼鼎的铭文中，记有中山国在当时也曾出兵伐燕。此事不见

于文献记载，这批古代文物的出土，不仅为中山国、燕国的历史补充了新的资料，也使人了解到在伐燕战争中有关中山国的一些具体情况，其中中山王𧮩壶铭文载：

……𧮩曰……𧮩𧮩(𧮩)𧮩(从)在大夫以请(靖)𧮩(燕)𧮩(疆)。氏(是)以身蒙幸(𧮩)𧮩，以𧮩(诛)不𧮩(顺)。

𧮩(燕)旂(故)君子𧮩(𧮩)，新君子之，不用𧮩(礼)宜(义)，不𧮩(辨)逆𧮩(顺)，旂(故)邦𧮩(亡)身死，曾𧮩鼠(一)夫之𧮩(救)，述(遂)定君臣之𧮩(位)，上下之𧮩(體)，休有成工(功)𧮩(创)辟𧮩(封)𧮩(疆)。

其中“𧮩”为人名，在铭文中称“相邦𧮩”，“相邦”为官职，即相国，相当后世的丞相。学者们认为“相邦𧮩”即《战国策》、《史记》中的司马喜。“𧮩𧮩”即“甲冑”。这是说相邦𧮩要身披甲冑亲自去伐燕，“以诛不顺”。文中记载中山国伐燕时，“燕君子𧮩、新君子之……邦亡身死，曾无一夫之救”。可见燕国国君在当时是很孤立的，就在这国破家亡的紧要关头，也竟无一人相救，表明燕国国君已完全失去了民心。

此事在《中山王𧮩鼎铭》中也有记载，其铭云：

……含(今)𧮩(吾)老𧮩𧮩(亲)𧮩(率)𧮩(三)军之众，以征不宜(义)之邦，𧮩(奋)𧮩(袍)𧮩(振)𧮩(鐸)，辟𧮩督(封)𧮩(疆)，方𧮩数百里，𧮩(列)城𧮩(数)十，克𧮩(𧮩)大邦^②。

由此可看出，在这次伐燕战争中，中山国趁机获得了不少利益，相邦𧮩亲率三军、奋袍振铎，取得土地数百里、列城数十座，可能还有其他战利品^③。

中山国虽参加了伐燕战争，但起主要作用的还是齐国，齐国想趁燕内乱之机侵占燕国，因此，当齐国进入燕国都城后，至战争结束时并未从那里撤出，一直占领燕国达二年之久^④。

齐对燕的占领，引起燕国人民的反抗，也激化了各国间的矛盾。赵国在得知燕王𧮩死的消息后，即“召公子职於韩，立以为